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動物敘事與中國崛起：姜戎《狼圖騰》和楊志軍《藏獒》裡的政治

Animal narrative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nse of politics in Wolf Totem by Jiang Rong and Tibetan mastiff by Yang Zhijun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8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 洪士惠(Shih-Hui Hung)

頁數/Page： 302-30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動物敘事與中國崛起：

### 姜戎《狼圖騰》和楊志軍《藏獒》裡的政治

Animal narrative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nse of politics in *Wolf Totem* by Jiang Rong  
and *Tibetan mastiff* by Yang Zhijun

洪士惠<sup>1</sup>

Hung Shih-Hui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歷經計畫經濟、市場經濟等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策略，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初以強大的經濟體迎來大國崛起的聲勢，稱傲世界。值此之際，中國大陸人民要如何在國家的帶領下持續拓展事業版圖，或是鞏固目前的地位，不僅是重要的思考點，也是顯現其民族意識、民族認同的來源。從鎖國到開放，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已成往事，面對全球性的競爭環境，「重返榮耀」的民族優越感凝聚了人們的向心力，共同思考富國強兵之道。在這本該是漢族中心主義傲視世界的時刻，文壇上卻出現兩部以少數民族為背景的「動物」主題小說，引人矚目，一是姜戎《狼圖騰》(2004)，一是楊志軍《藏獒》(2005)。這兩部作品甚至因熱銷之故，分別推出了續集、童書版或精華版等，形成特殊的出版現象。以狼與藏獒的「智慧」作為人類學習對象的敘述內容，加上現代都市中少見的鄉野文化，突出了這兩本小說的話題性與新鮮感，更為重要的是這兩部「以動物為師」的小說，隱喻著漢人的功利傾向：對外「攻擊」的

---

1 洪士惠，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投稿《文化研究》期間，承蒙審查委員悉心匡正文章未能周延之處，筆者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電子信箱：shih20033@saturn.yzu.edu.tw

狼性與對內「忠誠」的獒性，正是中國崛起的雙向條件。然而，漢族作家跨界觀察／學習少數民族動物文化所隱含的弔詭性，亦堪玩味。

## 一、圖騰崇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文壇興起「人」的文學，寫作內容以尊重個人主體性為要，顯現出文化大革命後人們企望回歸理性、秩序的內心趨向。尤其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集體主義或是因政治問題而被汙名化的「牛鬼蛇神」，意指「非人」內涵極其明顯，以致1978年改革開放後，關於啓蒙時代以來「人」的尊嚴、權力、理性等議題，又被重新提起。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文壇出現了《狼圖騰》、《藏獒》這兩部以動物為主題的小說，除了賦予狼、藏獒獨立思考力與智慧以外，不再以「人」作為主角的寫作方向，一方面雖揭示了「萬物平等」的道理，卻也再次喻示了漢人的政治意圖。《狼圖騰》、《藏獒》這兩部小說，除了反映在生態食物鏈裡，存在著例如羊怕狼、狗怕獒等等無法否認的階級劃分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察動物、擬人化動物思維過程中，思索著其對漢人的啓示或啓發。

《狼圖騰》描述文革期間知識青年陳陣至蒙古地區插隊落戶，他藉由觀察狼、養狼，思考蒙古人以「狼」為圖騰的原因。作者姜戎化身為主角陳陣，由狼性論述中方、西方殊異的文化性格。他認為西方人似狼、中國人似狗，並且引述五四文人魯迅的說法：「人+獸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種人」。「某一種人」直指中國人，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即在於缺少獸性之故。西方／遊牧／獸性對比於中國／農耕／家畜性的文化性格，蘊含弱肉強食世界裡優劣勝敗的基底因子。因而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問鼎世界時，「中國家畜性」的農耕性格必須改變，唯有使用比農耕歷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蘊含獸性的「遊牧精神」戰略方式，方能傲視群倫稱傲世界。

饒富興味的是，以蒙古狼為主的《狼圖騰》問世不久，另一部以藏族獒犬為主題的小說《藏獒》也因敘寫動物主題而受到注意。《藏

葵》內文敘述者是一位漢人記者，這位記者抵達藏地後，因拯救了一隻藏獒而化解了藏人的草場糾紛，當地藏人將他視為是吉祥的人，因此這位漢人記者又名「漢扎西」（藏語中，「扎西」就是「吉祥」的意思），小說即以漢扎西與藏獒之間的情感為主軸，試圖賦予漢人是藏人的「救世主」形象。即使《藏獒》出版之際，曾試圖與《狼圖騰》互別苗頭：「又正逢狼崇拜滾滾熱浪，禁不住心想：當人們總想把自己變成狼時，人性莫非只好讓狗替我們珍惜。」（《藏獒》封底）但這裡的「人性」卻也僅侷限在護家、護己的中心／忠心主義，未能判別善惡是非，例如小說中藏獒飲血王黨項羅剎的忠心被人利用後，就僅剩凶狠的打鬥形象，即便最後被漢扎西感化而「改邪歸正」，但是這樣的大圓滿結局，除了透露這類通俗小說的公式化特色外，也簡化了漢、藏之間的「政治」議題。

以狼與藏獒兩種動物的「獸性」特徵，聯繫軍事上「攻擊」與「防衛」的特點，也就頗具意涵。如何在保守的、封閉的中國封建文化中，加入這兩種具備遊牧精神的獸性特點，成為這兩部動物小說一再論述的重心。中國清末民初「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橫向學習西方文化的思考方向，在此已擴大指涉為縱向的中國歷史之根。以致《狼圖騰》除了一再強調西方遊牧精神之於中國農耕精神的對比性外，在後文附錄中也以大量篇幅說明「中華大地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本是同根生」的歷史淵源。若以「圖騰」內含「祖先」之義而論，新近以來象徵中國和平文化精神的「龍圖騰」，在此與「狼圖騰」合謀解消了中國／西方的對比之處，成為新興的尋根文學。如果說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尋根文學，是在經歷文化大革命階段後，作家們探索中國文化根源的文學表現，那麼這種出現於二十一世紀初的尋根文學則是中國崛起之際，中國人展現「優異種族」的心理需求。

## 二、以宗教之名——動物神化與生態平衡

《狼圖騰》、《藏獒》小說裡，狼、藏獒被塑造成既是具有獸性的動物、也是神的使者，具有宗教上的神祕性特徵。《狼圖騰》以狼

聯繫了「騰格里」神與蒙古人民之間的關係，狼因此成為草原民族敬畏、信仰的對象。而與蒙古狼相似，《藏獒》的獒犬在現實生活中也被藏人稱為「神犬」，小說也以藏獒的神性鋪衍情節。這兩部小說以動物的獸性與宗教上的神祕性，傳達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呈顯了現代文明社會普遍缺乏的神祕引力。古時，「狼害」曾帶給遊牧民族極大的困擾，積極逐狼、保障人群等法律條文於焉出現，但是另一方面，這些遊牧民族卻也在困擾之餘，敬畏、崇拜狼的力量，這也是人類社會的宗教起源說，或是圖騰崇拜的來由。1949年中共建政後，積極主張無神論、人定勝天的政治教育方式，導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人禍」事件的產生，1978年改革開放後，社會大眾除了重新思考「個人」的生存主體性外，亦漸漸服膺於這類無形的神鬼力量，呈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除魅」(disenchanted)論述外，現代人的「復魅」(re-enchanted)趨向。

《藏獒》中，作者讓文中藏獒以第一人稱「我」的擬人化視角，預告即將到來的危險境況，不只質疑了人類是否真為「萬物之靈」，也見出了人類有限的「視界」，更為重要的是，小說中揭示了藏獒與藏族起源、或者與宗教之間的關聯。相對於《藏獒》直接陳述且信服藏獒的神化或靈性特徵，《狼圖騰》則多了研究者的探索精神，由狼的舉動分析其與原始宗教的關係。主角陳陣的疑惑，除了顯現人類對於動物或世界的「無知」外，也間接承認了蒙古狼的神化形象。值得深思的是，無論騰格里神、薩滿教、或是藏傳佛教，《藏獒》、《狼圖騰》中的藏獒、蒙古狼兩種動物，最後皆因聯繫了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肯定。藏獒與藏傳佛教之間的神性關聯、蒙古狼與騰格里天葬的宗教關係，皆彌合了原始血腥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裂隙而具民族文化意義。

此外，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同時呈顯了「生態平衡」議題。《狼圖騰》述及，蒙古人過世後，由狼執行天葬的任務，將屍體餵狼不僅具有宗教意義，也減少狼危害人類的機率，在供/需之間維持大自然的生態平衡。舊時藏、蒙少數民族由原先的「武治」時期進入「文治」時期後，陸續迎來了藏傳佛教信仰，改變了文化生態。藏

傳佛教中「講功德，少言征戰」的宗教教育，影響了少數民族的精神思維，以致於《藏獒》與《狼圖騰》中人們便在「輪迴觀」的影響下，特別重視今生的行事作為。這樣的轉世輪迴觀，即使被認為是具有「宗教為政治服務」的政治目的，但無法否認其中也蘊藏了人們積極行善的文化風氣。更多的是，在這樣的觀念裡，維持了生態環境的平衡。例如《狼圖騰》牧民流傳狼會飛的「飛狼傳說」，民間流傳的神祕事件成為維持生態平衡的間接成因，藏民們在敬畏大地、敬畏神（鬼）的觀念驅使下，臣服於廣闊天地，繼而帶來寧靜、良善且安分守己的生活。人類學家曾經指出，巫術、宗教、科學是社會文明的發展進程，但是在現代世界中，科學並未完全取代宗教。漢人因急功近利或是自傲文明的發展，（刻意）忽視蒙、藏長期的文化習性，導致生活環境逐漸沙化或生態失衡的結果，讓人們開始反思「文明」的代價，因而宗教／科學兩者之間看似相悖，實是相依。

### 三、政治與文化收編？——少數民族的未來

《狼圖騰》、《藏獒》的兩位漢族作家以動物敘寫少數民族文化，似讓位處邊緣／邊疆位置的弱勢族群，得以受到漢人的關注。暫且先不論現代國家官僚系統所導致的階級問題，在以「漢族」作為主流中心的中國社會，政府雖制定且施行少數民族相關政策，然而在「少數民族」幾乎等同於「弱勢」的情況下，條文中的優惠、福利等施行政策，不僅反映少數民族先天、後天種種不平等的生存狀況，也預告了「存／續」少數民族文化的困難處境。中國少數民族大都位處於邊疆地區或者叢山峻嶺間，以城市（都市）生活為主的漢人社會便將這些地區視為落後地區，若以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文明進化論視之，少數民族的存／續問題在這種嚴酷的生存條件下更顯得岌岌可危。弔詭的是，《狼圖騰》、《藏獒》少數民族狼、藏獒皆具「尊嚴」性格；相對於此，少數民族人們面對外族治理卻備受壓抑，民族尊嚴不再，淪為漢人主流社會中的二等公民。《狼圖騰》蒙古族老人即使敬仰蒙古草原的傳統文化，卻仍不敵外來文化的強勢

收編，《藏獒》藏族活佛仰賴外來漢人父親的心理也相當明顯。中國歷來動輒得咎的民族關係，或者長期以來的政治教育，讓漢人作家有意／無意地傾向官方政策，甚至是乾脆在這問題上闕而不論地留下「空白」，以致漠視少數民族的尊嚴需求。《藏獒》中，代表藏族尊嚴的「活佛」、「喇嘛」最終竟跪謝漢人父親的解救，作者以漢族中心論的顯性／隱性教育方向，雙管齊下地改變藏族傳統文化。尤其小說主角藏獒名為「岡日森格」，漢文為「雪山獅子」之意(8)，政治寓意顯明。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以來，西藏流亡政府以喻意藏族史詩格薩爾雄獅大王的雪山獅子旗作為追尋獨立的標誌，因而文中漢人救治藏獒、藏人的情節安排，政治色彩濃厚。

政治意識形態如此，文化收編亦是。小說中，漢人一直試圖改變藏族傳統「復仇」文化。處於漢人立場的白主任，以文明進化論的眼光「糾正」藏人野蠻的復仇文化，最終竟由漢人父親「漢扎西」的神性，感化且改變了藏族人民的復仇觀念。尤其在藏族傳統文化裡，代表神的意志、維護草原法律和寺院意志執行者的鐵棒喇嘛「藏扎西」，最終竟也乞求「漢扎西」改變藏族草原法則。《藏獒》如此，《狼圖騰》也是。《狼圖騰》陳陣固然尊重蒙古文化，但其「養狼」、研究狼的舉動，實已冒犯當地禁忌，卻無人出面制止。或許這其中，有著文化大革命時期被迫全體噤聲、以免惹事的現實因素，然而「士可殺，不可辱」的民族尊嚴問題，在此卻被輕易淡化、消解。

中國現代文學「動物敘事」源頭始自五四時期，作家藉由描述動物表達文化寓言，其中，魯迅筆下描寫最多的動物是狗與狼，他的小說中，狗除了看家之外，表面的溫順恭謙被視為是奴性的表現，而狼「吃人」則顯得殘忍恐怖，魯迅以此寓意中國人的奴性與封建思想。到了1980、199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作家如張煒、賈平凹、郭雪波等的作品中，則已開始走向關注動物生命價值的寫實路線。直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崛起之際，以動物為主題的小說才又似乎回到如五四時期的文化寓言。《狼圖騰》、《藏獒》雙向表現了獸性攻擊與防衛護主的尊嚴需求，差別僅在於五四時期的狗與狼，彰顯了中國人的負面形象，二十一世紀初的藏獒與狼，則是在動物解放、去除汙名之後中國

所欲學習的正面文化。兩位漢人作家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文明論述基礎上，挪借了少數民族的神（話）學、生態觀、動物特色，論述國家競爭力議題。即便從五四時期的魯迅，到二十一世紀初姜戎、楊志軍兩位漢人作家的作品，具有「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差別性，但是透過動物形象的轉變以及通俗文學的傳播效力，內容與形式的相互幫襯，作家得以召喚更多的閱讀群眾產生認同意識。早先蒙古人及藏族人面對荒野生活中的殘酷、粗暴和危險，各自發展了宗教信仰、防護守衛人類生命的生存之道，進而向狼學習兵法、借重藏獒的護主能力，然而卻未出現現今文明社會的壓迫問題，但是當中國崛起之際，荒野中蒙古狼與藏人家庭中的藏獒動物特點，卻成爲漢人作家對少數民族開啓桃花源般「浪漫模式」(romantic model)之外，建立壓迫與被壓迫者對立關係的勢力根源。《狼圖騰》中關於文化根源的論述：「我們漢人實際上都是西北遊牧民族的後代。」(370)，也就真正成爲「虛幻」的想像共同體，一切都只是爲了中國崛起的認同需求。

## 引用書目

姜戎。2004初版、2005八刷。《狼圖騰》。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楊志軍。2005初版、2006三刷。《藏獒》。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